



中国到自由之路



罗素在华讲演集

袁 刚 孙家祥 任丙强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到自由之路
罗素在华讲演集

袁 刚 孙家祥 任丙强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在华讲演集/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

ISBN 7-301-07458-1

I. 中… II. ①袁…②孙…③任…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罗素, B. (1872~1970)—演讲—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5691 号

书 名：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在华讲演集

著作责任者：袁 刚 孙家祥 任丙强 编

责任编辑：刘乐坚

标准书号：ISBN 7-301-07458-1/C·0274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1.125 印张 315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内 容 简 介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是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家。他于1920—1921年到中国讲学,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以其特有的视角,对中国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与分析,被孙中山先生称为唯一了解中国文明的外国人。

罗素访华期间,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为激越澎湃的年代。他在华的9个月间,到各地巡回讲演,共做了大大小小近20个主题的演讲。一个时期内,报刊纷纷刊载罗素的讲演,政界、学界名人以及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发表评论,“罗素热”风靡全国,形成中国社会的一道新风景线。1998年,罗素在华讲演被中国文化书院评选为“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的重要文献”。

罗素访华,是中国近现代哲学、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但是罗素讲演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没有保留英文原稿,保存下来的只有经过翻译的中文讲稿。罗素的讲演曾以《罗素五大讲演》结集出版,但还有部分重要讲演散见于旧刊之中,给研究者(特别是外国研究者)带来很大困难,导致中外学术界在研究罗素访华的影响、罗素在华期间思想演变以及近代中外思想文化交流等问题上长期出现空白。

本书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全面梳理和编校,将散落在当时的报刊和书籍上的罗素讲演一并收入,同时附有勃拉克女士的部分讲演和“罗素来华行程及讲演总表”以及一些名人的有关评论文章,以飨中外研究者和广大读者。

Abstract

Bertrand Russell is a great Western philosopher, who has a deep impact on the world. He delivered lectures in China in 1920-21 and had close and extensive contacts with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other people. From his penetrating perspective, he made accurate and careful investigations on and analysis to the problems in China at that time. He was called "the only foreigner who knows Chinese civilization" by Mr. Sun Yat Sen.

Russell's visit to China encountered May Fourth Movement, which was a very turbulent era in modern Chinese ideological history. He had stayed in China for about 9 months, and delivered lectures for about 20 times around the country. In the time, Russell's lectures were published i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ne after another. Politicians, famous scholars, young intellectuals and students made comments on his lectures with great enthusiasm. Russell's popularity in the whole county created a beautiful scene in Chinese society. In 1998, Russell's lectures in China were chosen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literatures o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by Cultural Academy of China.

Russell's stay in China w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events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Unfortunately he has not left any manuscripts or notes, not even the summaries. What has been conserved i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his lectures. His lectures had been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as Five Major Series Lectures, however some important lectures were not covered. This brings many difficulties for scholars, especially foreign scholars, which lead to the neglect of Russell's influence on China and the changes of his attitude to China in the time of his sojourn.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Russell's lectures in China, and gathers his scattered lectures from th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that time, which have been carefully and completely checked. It also includes some Miss Dora W. Black's lectures, "a list of Russell's activities and lectures in China", and several scholars' critical articles. We hope that this book can satisfy the scholars and the readers.

编 选 说 明

一、罗素在华时间不足一年，在病榻上就将近四个月，因此为我们留下来的讲演并不多。除在北京的几次讲演成集出版外，其他散见于当时的报刊。编者遍阅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报刊，除他在杭州和保定的两个关于教育问题的短篇讲演（估计没有保留下来）外，其他尽数搜集于此出版。由于大部分讲演是从原始报刊上手抄下来，尽管几经校对，或有错讹，但请读者在作学术引用时，尽量对照原文。

二、本书文章在发表时体例不一，且年代久远，标点与用字与当前用法有较大出入。编者为便于读者阅读，在尽量保留史料原貌的前提下进行了以下的编校：

1. 原文无标点的篇目，由编者添加标点；原文用旧式标点或标点不符当今习惯者，由编者酌情改动。

2. 尽量保留原有的标题层次。原文不分段的篇目，为便于阅读，酌情予以分段。

3. 原文繁体竖排一律改为简体横排。

4. 原文中明显的错字、漏字、衍字进行了更正，对于通假字、异体字、古今字等一般也进行了处理：如“他”在指物时，一律改为“它”，“底”在表示领属关系时，改为“的”等等，这些改动不另加注明。

5. 原文中因直排而出现“如右”等字样，均改为“如下”。

6. 原文中的译名（人名、地名、国名以及术语），原则上均不作改动，部分附有英文对照，更正了错误的英文。

三、限于编者的时间和水平，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及专家不吝指正。联系 E-mail: pku2000@sina.com。

前言：一个历史的误读^①

——罗素中国社会改造思想的重新审视

孙家祥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是西方大哲,是对20世纪的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家。他于1920年9月到1921年7月间来华讲学,与中国的知识精英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在听众广泛的多次演讲中,他以特有的视角,深邃的思考,对中国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与分析,为中国的前途提出了诚挚的建议和美好的祝愿。

罗素来华的九个月间,其足迹遍及上海、杭州、南京、长沙、北京、保定等地,共做了大大小小近二十个主题的演讲。这些演讲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轰动,触发了思想界的思考与讨论,深刻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形成了颇具声势的“罗素热”。他演讲中涉猎的范围极广,包括哲学、自然科学、教育、宗教、世界政治等等,使中国思想界耳目一新。特别是他关于中国社会改造方案的论述,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至今看来同样具有现实意义。鉴于历史上对此的长期误读,尤其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一、罗素的中国社会改造思想概述

罗素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学者,他能够融诸多“矛盾”于一身:既能闭门书斋钻研高深莫测的学理,又能为自由和正义而战不惜锒铛入狱;既能埋头创造冷冰冰的纯哲学和数理逻辑,又能热情如火地探讨社会改造原理。本文则仅从其“实际哲学”的角度出发,探寻罗素社会改造思想的源流。

罗素的社会改造观是由以下三方面的思想而形成的:

^① 本文为北京大学的学士论文,略有文字改动。

1. “创而不有”主义。罗素对中国道家哲学情有独钟,在其著作《社会改造原理》的卷头就写有老子“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名言。罗素认为,人类一切活动都发生于两个来源:冲动与愿望,冲动是人们行动的基础,它的范围大大超过了愿望。人的冲动和愿望可以分成创造性的和占有性的,在政治和私人生活里的最高原则都应该是促进一切创造性的东西,从而减少围绕着占有的冲动的愿望。创而不有主义就是创造而不占有。罗素因此反对抑制冲动的西方基督教、中国礼教以及现代工业制度与经济制度,也反对基于占有冲动的战争,这是其和平主义以及个性解放思想的理论基础。

2. 方法论。即“实验的”(empirical)、“分析的”(analytic)、“细定的”(specific)。^①实验的方法,使他相信真理必以直接经验为准,不能全以先天理论来判断是非;分析的方法,使他能以科学的态度考虑问题,不凭主观臆断;而细定的方法则使他不为陈见所拘,而依特定的问题选择适宜的细定的研究与解答,并施用不同的方案。这是罗素观察与分析社会问题的出发点。

3. 批判态度与怀疑精神。罗素被称为一个“热烈地怀疑者”。^②他不仅具有学者所固有的理性主义和深邃目光,而且又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他是一个经得起失败的哲学家,他勇于正视自己体系中的矛盾,不断怀疑、修正和发展自己的思想;他反对任何宗教,批判违背科学精神的迷信与盲从;他是一匹世界思想史上的野马,任何缰绳都束缚不住,任何模子都无从套用;他是一位永远批判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但却几乎对所有通往理想的路径都提出了怀疑。因此梁启超称赞他具有“真正学者独立不惧的态度”,是“真正为人类自由而战的豪杰”。

罗素在来中国之前就已经声名远播了,他的三本关于社会批判和改造的著作已被译成中文。^③这三本书清晰地阐述了罗素的政治观、经济观与社会改造观。他从两种基本的价值观——“和平主义”和

① 赵元任:《罗素哲学的精神》,载《罗素月刊》第1期。

② 伍德·艾伦:《罗素:热烈地怀疑者》,孙乃修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③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London, 1916; *Political Ideals*, New York, 1917; *Road to Freedom: Socialism, Anarchism and Syndicalism*, London, 1918.

“创造性冲动”的概念出发，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一个把荣誉和权力赋予拥有大量财富的人而不是赋予智者的社会”，“没有财富，一个人就没有自由……没有权力，就没有发挥主动性的机会”。^①正是这种物质财富支配个人的前景导致了罪恶的资本主义体制，最终导致了世界战争。罗素也考察了三种社会改造的思想：工团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他认为工团主义反对国家过甚，而国家社会主义把权力过于付托国家，基尔特社会主义则介乎二者之间最为稳妥。这体现了典型的英国式调和精神。从中国现代历史上看，当时正是由于读了他的著作，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才成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信徒。

来华之初，罗素对将自己固有思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结合持谨慎态度。在被屡屡问及中国的社会改造方案时，往往闪烁其辞，但是也时而难免发表几句先入之见。如“兄弟现对于中国改良的方法，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开发中国财源，以为现时应该从教育入手”；“假设我有统治中国工业之权，我将不求助于俄，而求助于美，其次求助于英”；“有一种方法，对于中国情形适宜，习惯近便，这法子没有俄国闹得那样热烈。然实行起来，可以有效，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中国要想自立，非先把实业发达不可……中国要全然不经过资本阶级，恐怕不可能”。这些主张虽然零散而又都语焉不详，各有情境，但由于当时许多报章纷纷断章取义地转载，影响却很大。

罗素就布尔什维克主义问题也进行了多次演说。他的总态度是：贬其做法和后果，褒其动机与理想。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弊病是招致了世界各国的反对，对内压抑人民自由，往往“以力制人，而非以德化人”，因此产生了权力分配的极度不均，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已经偏离了他们的目的。他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倾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的真谛，硬不可稍稍假借，就陷入宗教态度的信仰”。但是罗素坚定地表示：“我相信世界上只有共产制度才能再造世界的幸福……现在俄国共产党对他们所提倡的制度的信仰固然是有点精简，手法有点辣，也许有点不到时期，但是

^① 引自本书所收罗素讲演，不再注明出处，编者注。

他能使人民有一种别国没有的快乐；他能使人耐劳冒险而保存一种新鲜畅快的信仰，是黑暗的西欧所没有的。”所以当有些中国人企图借其批评为反俄反共大做文章时，罗素进行了坚决的澄清。虽然如此，罗素这些过于理智和超前的言论，无异于在那些热衷于布尔什维克道路的青年头上浇了一盆冷水，难免引起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强烈反感。

不过这些都是罗素在未深入了解中国实情的前提下所发表的先入之见，罗素真正讲到社会改造问题还是他所作的题为“社会结构学”的五次讲演中。

其实早在罗素刚到北京，主人就把已拟好的讲演题目——“社会改造原理”交给罗素，但罗素以对中国问题尚待观察为由，先在北京大学讲了一些哲学问题，而后才以“社会结构学”为题进行了五次讲演。但他在此讲演中并没有直接提供中国的实际社会改造方案，而是着重于理论方法上的指导。

首先，罗素提出一定要循着科学的公律来进行社会改造。他说要用科学的态度来研究社会结构，依着自然的公律，而不是随着人的愿望。他指出：“我相信马克思的主张，社会的变迁，必依着科学的公律，要是有人擅把这公律违反了，一定非失败不可。世界的变迁，全赖科学智识的增进。”

他还高度赞扬了共产主义理想。他表白：“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相信世界上只有共产主义制度能再造世界幸福，医治战争留下来的病态，能使人觉得除剥削外还有值得做的事情。”他认为，即使共产制度一样别的好处都没有，单就它能用一种创造的信仰而使人信奉，就已经是世界希望了。

同时，罗素又反复强调共产主义要与实业制度并行。他认为这也是马克思所主张，但被其信徒们常常忘却的。他提出使世界陷于混乱的原动力是日渐增进的实业主义与国家主义，实业主义又分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分为帝国主义与自决主义。其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压制的人（即统治阶级）所主张的；而共产主义和自决主义是受压制的（即被统治阶级）所主张的。四种主义之间的互相争战使世界永无宁日。但实际上四种主义之间有密切联系，其中实业主

义是核心。他分析了实现实业主义的条件和其本身固有趋势，认为实业制度的发展必然使社会变成有机的，增加国家的权力，并使资本和权力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由于资本家不会放弃操纵人的生死与自由的权力；另一方面实业制度又通过教育使人民产生要求摆脱压制、寻求个人自由的民主政治诉求，而这种诉求的实现必须将所有资本统归社会所有，实行社会主义。所以罗素断定资本家的优胜的地位，“非经阶级的战争不能划除”。他说：“我并不是赞成阶级战争，不过这是实业主义必有的结果，照科学上的推论是如此的。这好像是一个人从半空跳下来，照物理公律一定要往下降，一定要摔死，并不是我赞成他摔死。”罗素实际上是继马克思之后，从另一个理论角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敲响了丧钟。

最后，他提出了评判社会制度好坏的标准。欲求社会改造，必须对理想社会制度有一个认识。罗素提出一个好社会有两个条件：第一，社会里人民现在的幸福；第二，社会以后再进步的机会。其中第一个条件是首要的，因为第二个条件往往很难衡量，所以他推崇一种较为现实的政策。他说：“一个国家是人民得要在里头过日子的东西，不是专门给人家书里念的，或是好像从山顶上看风景式的观赏的”，“现在的时代是现在为将来计的，是这一辈为下辈计的时代。”这同我们今天历经磨难才认识到的衡量制度优劣的标准何其相似？当我们回首历史舔抚自己的伤口时，才发现这副良药竟早已开好了。

可惜的是，罗素并没有来得及进一步详细阐述他对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就在赴保定讲演后一病不起，一些外国报纸上甚至刊登了他的死讯。在近四个月的病榻生活中，他进一步深思熟虑，在匆匆临行前，才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中国人企盼已久的社会改造方案，并为之起了一个美好的名字——“中国到自由之路”。回国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又写了好多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半年后又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①，俨然成为欧洲著名“汉学家”。但可惜罗素的临别赠言以及这部

^①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 New York, 1922. 1924年上海中华书馆曾出版赵文统的译本，流行甚少，又多有删减。直到1996年，东方出版社才出版了秦悦的中文新译本。

关于中国问题的专著，至今仍鲜有人知，这确实有负罗素的拳拳中国情结，更冷落了那些至今看来仍惊世骇俗的高论。

首先，罗素认为中国应先从政治方面入手，不应先从经济方面入手。中国要有一个好政府，因为“非有坚固正直之国家与有作为不可以贿赂之行政，中国不能建设何种纯正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他提出中国当时面临的三个问题是：（1）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2）在中国人的支配下发展工业；（3）普及教育。这三点必须同时着手，但上述排列顺序则表明实现这些目标的缓急。

罗素认为，改革中国的政治最好是采用俄国的方法，不宜于用西方的平民政治。“欲使中国国民智识普及，实业发达而又不染资本主义流毒，只有采用俄国共产党的方法最为合宜”。虽然俄国布尔什维克也有一些错处，如对待农民不好；但他们的制度属于初创，这些事件是免不了的，只可引为前车之鉴，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好处。

罗素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出路。他说，舍资本主义而欲生产，有四个方法，其中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仅适用于实业发达的国家，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适合于中国这样实业不发达的国家。但社会主义不可不开往自由之路。因为在国家社会主义中，要免除官僚专权和贫富不均的可能弊病，必须要使国家管理者爱自由、爱平等、实行民主政治，不能像从前的官僚一样只知自私自利。他认为中国人虽不像俄国人那样爱权力但却非常爱财富，这是中国最大的危险：“中国如愿发达实业而不用资本制度，非与此爱财心大战不可。”

罗素还断定中国须有“决心之士万人”来事改革。这些人要有彻底的精神，甘冒危险，牺牲生命，去推翻旧政治，建设新政治，振兴实业；这些人必须要诚实、能干、有智识，并能“采取西洋之所长而弃其所短才行”。罗素推断：“中国于最近之将来，宜有一种强有力的运动，此种运动胜于随波浮沉，不可以道里计也。”为此，“中国需要像列宁和马克思这两种才能大不相同的人士”；“中国的进步人士要获得胜利就必须自己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体”。他呼吁要启发民众的爱国心，因为中国人往往爱国心淡，爱家心切，以致社会各方面都酿成半生不死的现象；所以一种实在而且有作为的爱国心是最紧要的，对于

有智识而且足为人民表率的人尤其应有。爱国心要通过教育逐渐普及，但这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蹴就，必须靠“决心之士万人”来带动。

罗素反复强调中国必须自救而不能依靠外人，但在发展经济上要积极寻求外国助力（如引进一些外国熟练工人、贷款等）。要秉着开明的态度，向他国学习但又不受其支配；必须采用西方科学，但没有采纳西方人生观的必要。中国既不应奴隶式地服从旧的欧洲文明，也不要完全保守中国的旧文明，非有新文明产生不可。罗素预言：“中国人将来定可作世界的领袖，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我愿以此唤起中国新青年，因为这一希望并非遥不可及。”

罗素这一临别赠言的发出，可谓惊世骇俗。因为从罗素的固有政治理想及来华之初的言论看，他自己确实倾向于走和平改良的基尔特社会主义道路；但短短几个月之后，他竟然改变初衷，为中国开出了走俄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药方，这一转变发人深省。

不过，如果从罗素的思想基础看，这一“转变”又并非偶然，甚至也谈不上“转变”。因为根据他的方法论与怀疑精神，他不会依据固有成见而凭空臆造中国的社会改造方案，而必然要通过实际的观察来得出结论。他直到离华前的最后一刻才正式发表自己的主张，这种建立在长期观察基础上的结论，才是最为可靠的至少应该也是比较接近于“真理”的。因此，若硬要说“转变”的话，也是中国的所见所闻“转变”了他。他在临别讲演的开头便申明：“吾今日冒险对诸君发表吾对于改良中国之意见，此乃吾抵中国后与中国人共处时渐次发生者，皆吾初上岸时所无也。”那么，罗素都看到了什么呢？

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时政腐败，这使罗素认识到中国的独立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加以解决，要建立一个好政府。因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军阀的惠爱就像外国的慈善一样不能依靠”。只有建立一个有序政府，才能抵抗侵略，独立发展实业，自己管理教育。

罗素又看到中国国民未受教育，实业又不发达，这不具备他心目中施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条件，反与他所观察过的俄国的现象相仿。况且他是来中国寻找挽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良方的，其出发点首先是不步欧洲的后尘，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他认为：“欲共产主义

之成功，除非倚赖俄国而后可”；只有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最为适当。

通过与中国新知识阶层的广泛接触与交往，罗素看到：“少年中国”具有一种英雄主义和公共精神；中国受教育的学生日益增多，他们的眼光令人钦佩，一代比一代更具优点；他们不仅具有公共精神，而且还是唤起全民公共精神的一股强大力量；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罗素虽然有时也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只是空谈理论而轻视实干持批评态度，但却断定：“这些青年改革家不需很长时间就能使中国复兴。”可见，当社会主义在中国已渐渐成为一个滚滚的时代潮流之时，罗素决定顺应它。他也根据中国并不认同于强权和残暴的传统，希望中国的新青年能在这令人失望的世界，重创新文化。他在临别赠言中强调，社会的重大责任，自然要赖青年负担，就中国的学生方面看，进取的精神极富，前途很可乐观。罗素留下了这些金玉良言和美好的祝愿，也带走了无尽的希望。

二、重新审视与评估

罗素是在中国思想和政治发展的关键性时期来到中国，并且发表了如上所述至今看来仍很有意义的言论。然而他思想的光辉却被历史误会所掩盖，没有起到其所应起到的作用，这是很令人痛心的。我们痛定思痛后，不禁要探寻一下其背后的原因。

首先，中国人的过热期待令罗素难以应付。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的中国，虽然有强烈的反权威主义，但那主要是反对封建传统的，对西方权威人物却很迷信。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看来，罗素以其知识的力量和他对社会改造的研究将对中国现实问题有价值超凡的洞察力，这也是他们邀请罗素的初衷，但这首先在目的上就是不现实的。凭罗素作为哲学家的声望，而希望这位西方人未经对现实的详细了解便能为中国提供救世良药，更是表现出一种“急性病”。况且罗素是怀着对西方和对苏俄的双重失望来华的，他意图从中国寻找新的希望，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不料他一下轮船便有中国人围着他询问社会改造方案，确实勉为其难；他也只能疲于应付。不过即使这样，他仍然反复表示，他来中国是想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将来想对中国

有所贡献，希望直接去调查，有机会详细进行研究，此前则不敢有所论断。^①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热情听众并未注意给他这个机会，反倒抓住罗素初来时不经意的几句话，而大作文章。

其次，众口难调，也使罗素巧妇难为。中国当时正处于思想界交锋最为激烈的时期，每一派都希望能够引权威人物为同道来加强自己主张的说服力。基于这些不同思想意识也就产生了对罗素不同的期望和对他言论的不同解释与理解：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认为从罗素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则从他去苏俄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赞同而认为他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自由主义者则看重他热烈拥护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态度。每一派对罗素的认识都如盲人摸象一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正由于每个集团都把罗素奉为自身价值观的偶像，所以后来他们都反对罗素太传统了，或者根据他们的正统观念来说其思想至少是“不彻底的”。在这种情况下，偏于调和的罗素思想显得有太多的疑问和反复，而不能直接影响社会活动。毕竟当时中国的潮流不认同那种学者般的理智，而是崇尚革命的热情。所以在壁垒分明的思想激战中罗素必然缺乏市场，甚至当时并没人对他的主张仔细品味。

第三，罗素正处在两难困境之中。这既有他自身思想的矛盾，也和他的“中国情结”有关。

罗素那时正处于自己思想的反思期。他表白说：“我的心中充满了疑惑的痛苦；西方文明的希望日益苍白。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心境，我开始了我的中国之行，去寻找新的希望。”^②他抱有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希望能在中国检验一下正确性及适用性，但当中国的情况暴露在罗素面前时，原本颇为自信的罗素则发现他的社会思想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在中国是不适用的。经过在中国的交谈、观察、辩论与研究，他的判断随着他信息量的增多和理解的深入而不断改变。面对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罗素陷入沉痛的反思，他又要面临一件类似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评价这样为难的事。但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和

^① 杨端六：《和罗素先生谈话》，《东方杂志》，18卷1期，1921年1月10日。

^② 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东方出版社，1996，第60页。

学者的良心，他才终于决心在临别之际为这个迷途中的国度进一言，努力向自己的固有思想开战。

罗素迟迟未表明立场，也与他不希望自己的言论造成“少年中国”的进一步分裂有关。在罗素看来，这批人是中国的脊梁，因此，希望他们能够团结一致、思想统一。他担心自己的方案会对中国的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导致新知识界的论战乃至分裂；最起码，他不想自己在华亲眼目睹这场思想的火并。所以他一直等到临别时才吐露真言，但可惜却为时已晚。一场论战早已发起，而他本人则被卷入这个思想漩涡，并被迅速“定性”。罗素若知此情，一定十分委屈和抱憾。

第四，一些客观条件，如时间的短暂、疾病的困扰等，也制约着罗素中国社会改造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罗素在华的9个月，其中一病就近4个月，虽然这段病榻生活使他有了冷静思考中国问题的良机，但是在这个最为关键的时段中，罗素无法澄清先前由于自己的含糊其辞所造成的误会；他自己逐渐形成的中国社会改造思想也无法大规模及时地宣讲于世。这段时间他在中国思想界的“消失”，使许多人“遗忘”了他，而只囿于先前的成见。虽然罗素在“临别赠言”中澄清了自己的主张，但因其显得突兀，而受到了忽视，并可能被人为地低调处理，随后则人走茶凉。真可谓天不作美。

最后，舆论的误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五四”时期不仅思想派别众多，而且大小刊物林立，罗素来华期间，各报刊纷纷转载罗素讲演及有关评论文章，形成一股“罗素热”。但实际上，对罗素讲演的翻译有很大出入，往往断章取义，只重结论，不重过程，读者无法知其全貌。况且这种演讲有讲无问，缺乏双向交流，更增加了误传的可能；加之一些人在评论文章中对罗素言论有意无意的误读，使罗素的“假思想”比“真思想”流传更广。而在当时大多数人只能单凭译文或评论来认识罗素的状况下，就难免造成谬种流传的历史误会，这实为无奈。

梁启超在“讲学社”为罗素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词说，希望罗素能成为“点石成金”的吕纯阳，并把能够点石成金的指头（也就是研究学问的方法）交给中国人。这种态度十分难能可贵，只可惜当时大多数人没认识到这一点，而把眼光仅盯在“金子”上。不过罗素作为中国现

代思想文化改造促进者的角色，已使他此行具有历史性意义；事实也的确证明，他的基本方法也为中国青年一代进行伟大的思考与探索作出了贡献。

目前惟一公认的罗素影响是他引发了社会主义论战。流行的说法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宣传、扩大和向马克思主义挑战，是借罗素来华讲学之机发动的”；“罗素极力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十月革命，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到处鼓吹中国太穷，当务之急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实业和兴办教育”；“罗素的来华满足了中国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愿望，为张东荪等人向马克思主义进攻提供了有力武器。”说来罗素确实委屈，显然他并无意发动这场论战，而是别人在发动时引用了他的话。

其实罗素到底主张什么，在其临别赠言中昭然若揭。当时，傅铜先生在《罗素月刊》上专开了一个关于“中国向自由之路”的讨论，驳斥了张东荪的“后言”。^① 原本曾撰文申述罗素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杨端六先生也恍然大悟：“可见基尔特社会主义，罗素先生只认为英国说法，而不为中国立词”；并对罗素大加赞誉，认为这个方案是“救时之良药”。^② 虽然罗素并未因此而平反，但经过他的“反戈一击”，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因无法自圆其说，渐渐从中国销声匿迹，^③ 这不能否认也有罗素的一份功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分裂发生在1921年。他们虽然都是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的民族斗士，但是却各自在探索一条适应自己思想体系的改造方案。罗素来华引起了他们的不同反应：自由主义者故意冷淡罗素，因为他们宁愿把同时来华的杜威奉为同道；马克思主义者对罗素敬而远之，但罗素却成为引导许多青年日后走上这一道路的布道者，虽然他不乏对布

① 见《罗素月刊》第4期，转载自1921年7月31日《时事日报》。

② 杨端六：《罗素先生去华感言》，《东方杂志》，18卷13号（1921）。

③ 张东荪后来在30年代思想也开始转变过来，他认识到：“所谓行会的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产业已发达的国家是可行，唯中国尚不足以语此”；“想不借国家的力量而听人们各自企业，必不能与外来压迫相抗衡。”见《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载《中国民主社会党》一书，第54、55页。